

第一章

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展中的 “日本影响”因素

第一节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 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

1915年9月至1919年5月，习称这段时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和任务。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在运动前期是完全遵循着这个宗旨并逐步完成这个任务的。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习称这段时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这段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分歧斗争日趋突出，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坚持了反对旧道德、旧文学的战斗，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依然不同程度地遵循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里主要存在着以下五种倾向：

首先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一项伟大的开拓性的工作，但他俩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难免宣

传了含有较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李大钊的“互助进化论”，陈独秀的克鲁泡特金式的“互助论”及改良主义等。他俩宣扬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依然坚持着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内容。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继续张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提出“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在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刊物上，陈独秀发表《男系制与遗产制》、《解放》等文，他与李大钊相呼应，继续阐述反对封建文化的主张：“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底‘三从’大义”，“这是社会制度上的缺点之一，也是要解决的社会底重大问题”。“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到解放底圆满效果。”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在李大钊、陈独秀这段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为数不少，可见，李大钊、陈独秀两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之际，依然树立着新文化运动前期所树的旗帜。

其次是以胡适为代表，极力宣扬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胡适于1919年6月挑起了新文化阵营内部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但作为运动的发起者、指导者之一，他在这段时期里，依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内容。1919年11月，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还联名发表《新青年杂志宣言》，重申了新文化运动要重视自然科学与实验主义哲学，要破除迷信与幻想等内容。

再次，以周作人为代表，极力宣扬日本的新村主义，推行中国的“新村运动”。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进行思想改革，主张“缓进的革命”，这也是周作人的新村思想的主要内容。他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的理论来张扬人道主义，依然是在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内容。

还有，以鲁迅为代表者，主要以自己的作品显示着文学革命的实绩。那段时期，鲁迅的作品特别地重视宣扬以“为人生”作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例如小说《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及杂文《随感录》等，其内容仍然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

此外，钱玄同、吴虞等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起指导者，在这段时期里，不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彼此有何差异，但坚持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方向却是一致的。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交错复杂的。但是，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这也是1919年前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任务的继续和深化。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必然性，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在新文化运动阵营里出现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学说、观点，这些不同的学说和观点，虽然相互牴牾，但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文化前提之下的新文化阵营里的各种不同的学说、观点，谁也不能包容谁，谁也不能替代谁，谁也不能支配谁。真的能够达到一种学说、观点去包容、替代、支配其他学说、观点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就不可能存在，或者说，以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为旗帜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为什么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里（特别在运动后期）存在着主张的差异，甚至于主张的对立的情况之下，还能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宗旨，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任务而协同作战、共同奋斗呢？笔者认为，从考察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的文化素质形成的来源中可以得到回答。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名存于史册的不少，但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有以下七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吴虞。这七位人物除胡适外，其余都是 20 世纪初期的赴日留学生。

陈独秀 22 岁时于 1901 年 11 月到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先进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后于 1902 年 9 月入日本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军事。

李大钊 24 岁时（1913 年）赴日本，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

鲁迅 21 岁时（1902 年）赴日本，先读于日本弘文学院，后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周作人 21 岁时（1906 年）赴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特别预科、立教大学文科。

钱玄同 19 岁时（1906 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

吴虞 33 岁时（1905 年）赴日本，考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四科专攻法学。

以上六位人物，除吴虞岁数稍大一点儿外，其余留学日本时都很年轻，也正是他们接受新的文化思潮，形成自身的文化结构，构建并逐步确立世界观的最佳时刻。他们留学日本，日本文化以及盛行于日本社会的种种西方近代思潮，必然会给他们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胡适亦然，胡适于 1910 年（时值 19 岁）赴美留学前就读于由从日本学成归国的学生创办的中国公学。留日

归来执教的先生，对胡适的身教言传，自然不乏日本文化的内容。

任何一项历史性的运动都是由当时的杰出人物发起和指导的。这些杰出人物自身的文化素质（即他们接受并确立的人生观和文化知识结构等），是他们发起指导的历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运动的某阶段还左右着运动发展的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中国戊戌变法运动的发起指导者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中的对中国封建传统道德的强烈的认同感，致使他们发起指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走着热闹一时、急骤短命的历程。又如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发起指导者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中的开化进取、发奋革新精神，使他们指导的明治维新运动成为日本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向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既然历史运动的发起指导者自身的文化素质于运动的兴起发展是如此的重要，那么，考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就应该认真考察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的自身的文化素质。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的文化素质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其接受并确立人生观及文化知识建构的最佳时期里是在日本留学。并且，他们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即发起指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所以，考察他们留学日本时所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不仅能窥视到他们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所具有的文化素质特征，而且能探寻出他们留日时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与中國新文化运动发展之关系。

那么，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接受了哪些思想文化内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接受了盛行于日本社会的西方近代思潮——自由平等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赴日留学前，日本经过了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启蒙文明开化运动的中心思想是西

方的“天赋人权说”，把“人权”作为“天赋”来加以肯定。福泽谕吉《劝学篇》的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作为日本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弘扬“天赋人权”的代表理论，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后来，以“天赋人权说”为基础兴起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极力主张民权主义：“……日本帝国的人民，就是说，三千多万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应各享有其一定的权利，用以保存生命，维护自主，努力业务，增长福利，而为独立不羁的人民，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权利不是威权所能夺取，不是富贵所能压制，这是上天平等地赋予人民的，也是人民所愿意保有的，所以人民应该为它勤勉奋斗。”^①可以说，自由民权思想在日本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基础的，那就是反抗封建专制的各种反人性的压迫和桎梏，促进人民对于“天赋之权”——自由、平等的自觉和发扬。日本自由民权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近代的爱国主义。日本自由民权论者反复强调：“人民必须关心国事”；“国家必须发扬民权自由”；“不依靠人民的自主自由和宪法，国家就不得巩固”，“不发扬民权就不能发扬国权，保持独立；专制政治最后不得不亡国卖国。”^②

宣扬天赋人权，提倡自由平等，弘扬爱国精神，这些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赴日留学时接受的主要思想文化内容。

1901年5月，留日学生秦力山、沈之翔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倡推翻清王朝。同年11月，陈独秀到了东京，他很快响应《国民报》主张，接受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新学说。1902年9月，陈独秀加入了留日志

①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4—75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

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的新团体——青年会，成为留日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先驱者。

李大钊留学日本较陈独秀晚，留日期间，他比较突出地宣扬了西方自由平等学说：“顾此适宜之政治，究为何种政治乎？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先进国民之所以求此政治者，断头流血，万死不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经年郁茂以有今日之盛。”^①在这里，李大钊宣扬自由平等学说，连用语“民权自由”也是“自由民权”的套用。自然，他在此文中写的“先进国民”主要指的是日本国民。可见，日本盛行的自由民权说对他影响之大。观照日本，李大钊宣扬自由民主精神仍然根基于他的爱国心，恰如他在此文中写的“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蓄于神州之陆”，渴求在中国大地开放自由平等之花。

鲁迅留日时接受的西方自由平等学说在其留日时写的论文中已有论述。例如，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对心向往之的拜伦描写道：“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崇尚拜伦式的为独立自由人道而战的精神，正是鲁迅留日时接受的自由平等学说的内容之一。又如，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提出了反对封建束缚、解放思想、唤起民众的纲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个纲领也是鲁迅留日时接受的自由平等学说的内容之一。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时所接受的自由平等思想与日本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自由民权思想是基本相同的，它们都是侧重于启迪国民，

^①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7—158 页。

提高国民的自由平等意识和为独立自由战斗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接受的自由平等思想还带有日本的一个特色，就是启迪国民的自由平等意识之际，强调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李大钊在日本时宣扬自由平等精神目的在于“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①鲁迅在日本宣扬自由平等学说目的在于通过“立人”达到“立国”，促进“国人对于维新（指日本明治维新——引者注）的信仰”。^②达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③陈独秀说：“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④联系他的同人在日本留学所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可见陈独秀说的是事实，那就是在自由平等精神与爱国精神相结合方面，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接受日本的思想文化内容与日本的启蒙文明开化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内容达到了一致。

第二，接受了日本社会的“人的思考”的社会意识。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国与国是平等的，但如果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前提，“一国独立”是“一身独立”的必然结果。福泽所谓“一身独立”，主要是启迪国民的个人主体的自觉，这也是对“人的思考”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5 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 页。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载《鲁迅杂文·小说·散文全集》（四）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89 页。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3 页。

的社会意识，是对日本长期的封建社会束缚人性的愚昧现象进行反拨，也是对西方近代思潮“人的发现，人的觉醒”的呼唤。但福泽所谓的“一身独立”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个前提，“一身独立”要达到“一国独立”，实际上是强调日本人民需要树立近代统一国家的观念。福泽谕吉的这个命题在日本明治社会中深入人心。然而，日本明治社会向大正的过渡走的却是“一国独立、一身独立”的路程。明治社会首先是国家的统一独立，形成了强烈的国民意识，经过自由民权运动后进入大正社会，在市民的自由主义“个人意识”与绝对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国民意识”相互矛盾之中，才表现出日本近代的个人自觉，大正文化显示出“国民意识”的薄弱和“个人意识”的加强，表现出了“人的思考、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为主要内容的“一身独立”精神。自然，这也是明治时期启蒙文明开化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果。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时所接受的日本对“人的思考”的社会意识是建立在福泽谕吉“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理论基础之上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形成他的“立人”、“立国”思想。他认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人张，沙聚之邦而之转为人国”。^① 中国要进化，要发展，首先要立人，在“立人”的基础上进而建立“人国”，这个“人国”就是日本式的强国，但鲁迅特地称为“人国”，说明他的着眼点在人。重点在于“一身独立”（“其首在立人”），只有“一身独立”，中国国民达到理想的人性，中国才有救，舍此，中国的独立则无意义。鲁迅留学日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3页。

本，观照日本社会“个人意识”与“国民意识”的矛盾后选择了
对“人的思考”。

李大钊留日时在此问题上与鲁迅是同道。他认为：“苟吾四
亿同胞之心稍有活泼之机，创造改造之业姑且莫论，但能顺应此
环境而利用之，已足以雄视五洲威震欧亚矣。”^①李大钊在此也
是将“人的觉醒”（同胞心稍有活泼之机）作为国家独立强盛的
前提。如果说鲁迅、李大钊留日时对“人的思考”，仅仅是强调
“一身独立”为“一国独立”的重要前提的话，那么，陈独秀在
日本对“人的思考”强调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1914年，陈独
秀在日本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他指出：“国家者，保
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
所荣，亡之无所惜。”他认为像中国那样摧残人民（对“一身独
立”的否定），不如迎接海外之师来灭亡中国（对“一国独立”
的否定）。

为什么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主要接受对“人的思
考”的社会意识，特别地强调“一身独立”的内容呢？这与他们
观照日本社会有关。

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以前，日本对“人的思考”的
社会意识是继续强化着福泽的“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的命题。
西方近代思潮的“人的思考、人的发现、人的觉醒”的内容在国
民中不断地强化。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胜利使国民意识加强。
尔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使“一国独立”的国民意识与“一身
独立”的个人意识均得到强化。联系到中国的失败、孱弱的历
史，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在留日期间，特别地反省日本对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74页。

“人的思考”和“一身独立”命题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也是他们对日本近代社会思潮发展的观照和反省，这种观照和反省正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所写的：“日本维新以来，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侮矣。若犹张皇六师，目不暇给，竭内以饰外，赋重而民疾，吾恐其国日强，其民胥冻馁以死。强国之民，福利安在？是皆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者也。”因此，可以说，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在日本所唤醒的对“人的思考”的社会意识，主要是对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文明开化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一身独立”精神的接受。

第三，接受了日本国民创造精神。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写了《青春》一文。“远从瀛岛，反顾祖拜”，他观照日本，基于“青春”特点，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历史使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关键在于青春式的创造精神。李大钊认为，发扬青春式的创造精神就要与旧的传统思想决裂，“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李大钊提倡的青春创造精神正是他留日观照并接受的日本国民创造精神。李大钊留学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社会的各方面打破了旧习，这是举世瞩目的。日本明治维新在思想上完成的伟大的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创造精神的弘扬。打破旧习，使弱小的封建的日本很快地跃为资本主义的强国，“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莽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①李大钊提倡的青春式的

李大钊：《青春》，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创造精神，正如日本国民创造精神，或者说，是对日本国民创造精神的接受及推崇，两者均强调在打破旧习之中进行思想革命。

鲁迅留学日本时也接受了日本国民创造精神，进而形成了他的超人式的创造精神。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接受了盛行于日本思想界的尼采的“超人”思想。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写道：“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致。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盖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虑而可知矣。虽然，此亦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鲁迅认为 19 世纪的欧洲文明的流弊是个人被集体抹杀，主观精神被物质生活所淹没，纠正这种弊病就是要提倡精神力量，发挥主观创造性。而且，这种精神力量（主观创造性）有赖于超人出。或者说，鲁迅留学日本时在呼唤着尼采的超人式的主观创造精神。尼采的超人具有常人未具的特征。他意志顽强，体魄强健，他自持力强，顺性率真。日本维新革命后国民创造精神，总体而言，具备了尼采的超人特征。陈独秀对此用比喻手法进行了较准确的论述。他用“兽性主义”来比喻日本超人式的国民创造精神。他说：“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白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备，而烛远之士，恒期期以丧失此性为忧，良有以也。”^①

^①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6 页。

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时，接受了日本国民创造精神，从而形成自己的创造精神，无论是“青春式的创造”，或者是“超人式的创造”，都为他们归国后发起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接受了日本启蒙思想。启蒙，即启发人类无知蒙昧之意。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启蒙主义是在 18 世纪欧洲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发生的，这个思潮通常又称“十八世纪启蒙”。含有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中世纪的蒙昧（黑暗）的意思。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起于思想启蒙。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正是启蒙思想的具体实践。日本启蒙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实行启蒙专制主义的文明开化政策，二是通过吸引西洋文化来加以促进文明开化。两者都是“由上而下”、由明治绝对主义政权强制执行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接受了日本启蒙思想。他们深恶痛绝于中国国民的愚昧、孱弱，“神衰力竭，气尽能索。全国之人，其颖智者，有力仅以为恶，有心惟以造劫。余则死灰槁木，奄奄待亡，欲东不能，欲西不得，养成矛盾之性，失其自然之天，并其顺应环境之力而亦无之”。^①“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虽一世名流，每持谬说，若夫怀抱乐观之见，轻论当世之事，以为泱泱大国，物阜民稠，人谋不乖，外患立止，是何见之疏也！”^②“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捩楚鱼肉之；而此孤儿，复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6 页。

^②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6 页。

赁匪，凡得几许。盗据其室，持以赠盗，为 主人者，漠不加察……’^① 针对如此国情，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在日本留学时特别地关注着日本启蒙思想。他们在日本形成的启蒙观与日本启蒙思想的特征大致相同。首先，他们认为对愚昧孱弱的国民进行思想启蒙也应采取明治绝对主义的文明开化政策，也就是“由上而下”地对国民强制实行文明开化。李大钊提出在中国实行立宪制，“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潮流”。这样，“吾国民之善用其秉彝，以之造福邦家，以之挽回劫运”。^② 他提出实行立宪制以国家的强力来造福“劫运”的国民。陈独秀在日本接受启蒙思想形成他的思想启蒙观，在“由上而下”地对国民强制实行文明开化方面走得更远。他认为，中国国民愚昧、孱弱到了极点，自己已不能依靠自己的国家来改变此状。怎么办呢？迎接“海外之师至”，由列强来强制中国人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以改变中国愚昧孱弱的惨状。鲁迅也是首肯日本思想启蒙采取的“由上而下”地强制国民实行文明开化的，不过，鲁迅这个“上”非指国家的强力，而是指天才式的先觉者——“超人”。“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无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次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也。”^③ 无论依靠“立宪制”，或是“海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载《鲁迅杂文·小说·散文全集》（四），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89 页。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5 页

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8 页。

外之师”，或是“超人”，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日时的启蒙观均与日本启蒙思想的“由上而下”地对国民强制地实行文明开化是一致的。其次，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认为，对愚昧孱弱的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应吸收西洋文化。陈独秀首肯法兰西的近世文明，称近世文明为西洋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①李大钊张扬欧洲文艺复兴的路德之新教，法兰西革命的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学说，英之宪章运动，美之独立宣言等，认为：“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②鲁迅推崇拜伦、尼采、易勃生等，指出“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而“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③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在日本形成的启蒙观，体现了日本启蒙思想的特征，即吸收西洋文化来促进对国民的启蒙和文明开化。日本明治政府的思想启蒙，吸收西洋文化，主要是吸收“十八世纪启蒙”的理性之光——“自由、平等、博爱”学说。但是，他们企图通过吸收西洋文化来促进国民的文明开化政策，依然立足于日本的社会现实。“十八世纪启蒙”的理性之光经过了日本社会的过滤，因此，日本的思想启蒙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在日本社会的移植，而是用“过滤”了的“十八世纪启蒙”的理性之光来照亮日本的社会，其特征就是日本的启蒙专制主义，“由上而下”地对国民实行文明开化。所以说，日本的思想启蒙没有“由下而上”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这个特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②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4—75页。

征深深地影响了留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李大钊热衷于中国的“立宪制”，陈独秀欢迎“海外之师至”，鲁迅提倡尼采的“超人说”，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日本启蒙思想的这个特色。自然，当他们回国发起中国新文化运动后，他们在日本形成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所接受的“自由平等思想”、“对人的思考的社会意识”、“国民创造精神”、“启蒙思想观”都是盛行于近代日本社会的思想文化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学习接受西方文化的产物，但是，由于西方近代文化在日本社会的演变，已经经过日本社会的“过滤”才扎根于日本的。接受西方文化的日本，其近代文化表现为一种全新的异质文化的融合，在大量地持续不断地摄取西方文化基础之上，通过了自己的改造整合，形成了日本近代文化，体现了近代日本大和民族的生机活力。对此，留学日本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在日本，接受了日本近代文化（他们接受的内容虽然是日本从西方文化接受过来的，但已成为“过滤”了的日本近代文化了），回国后肩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摧毁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这无疑是一场艰巨而顽强的战斗！因为他们面临着的是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一方是接受过来的日本近代文化（总体而言已经西方化了），一方是长期熏陶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地道的东方化），两者之间的碰撞，无疑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历史的发展必然导致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挑战。20世纪初期，赴国外留学接受西方文化的文人主要是留日者，他们中的杰出者企图用他们在日本接受的近代文化来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挑战。这样，由他们在中国发起新文化运动势在必行。的确，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就是由20世纪初期这批杰出的留日文人承担起的。

第二节 日本近代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相关点

笔者认为，阐述日本近代文化与中国新文化之间的几个相关点，可以窥视到：中国新文化运动指导者留学日本时受到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他们归国后，发起指导的新文化运动也借鉴了日本的近代文化。

日本近代文化与中国新文化有哪些相关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民主”的形成过程观照了日本近代的“自由平等”思想。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提出“科学与人权”的口号后，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同人纷纷撰文，宣扬解释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人权”（后改称为“科学与民主”）。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实质是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特别强调青年的自立，反对盲从迷信，愚昧无知。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即人权，强调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作为宗旨贯穿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始终。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科学和民主”的内容愈加严密、丰富。在运动发起之际，“科学与民主”的提出观照了日本近代的自由平等思想。

特别地体现了日本近代的“自由平等思想”主张的是自由民